

大公报

闲话

张刃 著

鲜为人知的史实，民国生活的素描

百年大公报，记录跌宕国运

中国报业唯一跨世纪的金字招牌

新闻人「文章报国」，「文人论政」风靡天下

毛泽东、蒋介石刮目相看的全国舆论重镇

毁誉参半的评价，棒杀、捧杀的偏颇

有依据的「闲话」，可读、可信

人民出版社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重慶市民舉旗
報道日本投降消息的大公報 資料圖片

闲话

大公报

张刃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马长虹

封面设计：周涛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话大公报 / 张刃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7

ISBN 978-7-01-015496-1

I. ①闲… II. ①张… III. ①《大公报》-史料 IV. ①G21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9989 号

闲话大公报

XIANHUA DAGONGBAO

张刃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300 千字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01-015496-1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XIANHUA DAGONGBAO

目 录 ◀

我与大公报 (自序).....	1
一、走入历史的新记大公报	5
——大公报研究中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	
大公报是“百年传承”吗?	6
此大公报非彼大公报	8
“三驾马车”跑的不是一条道	11
大公报“投靠蒋介石”辨析	15
也说“小骂大帮忙”	19
“四不”缘何变“两不”	23
“王芸生就是大公报”质疑	28
“大公人”怎样看大公报	30
用历史的眼光考察大公报	34

二、大公报记者笔下的国共两党	37
——“客观报道”难掩主观倾向	
“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	37
大公报国共报道的基本脉络	39
《豫灾实录》与大公报停刊事件	41
重庆谈判期间的大公报	49
大公报记录的国民党接收	63
军调、和谈、大公报	74
两次长春之战与三位报人的命运	106
大公报缘何《哭四平》	120
大公报揭露的东北败象	127
国民党对大公报“翻脸”了	136

三、大公报的采编运作特色	146
——兼谈大公报人的职业追求	
从大公报新闻专电说起	146
琳琅满目的新闻版面设置	159
自由、独立的记者、编辑	168
大公报人的职业精神与追求	175
“新闻检查”与记者抗检	184
四、转折年代大公报旧闻录	197
——重温几段被淡漠的历史	
汉奸们的嘴脸和下场	197
警觉日本“将来的可怕”	212
大公报“反苏”的是是非非	235

《大公报》上看“国大”	252
阎锡山“宏论”难逃“宿命”	267
天津《大公报》停刊前的那些日子	280
五、从“新记”到“官媒”的转变	298
——说说天津进步日报与北京大公报	
大公报“自己骂自己”	298
脱胎换骨的“新生”	304
附 录	308
张高峰小传	308
何必“棒杀”与“捧杀”（代后记）	311

我与大公报（自序）

在中国新闻史上，大公报以其独具特色的“文章报国”、“文人论政”办报实践而声名远播，也同样因此而毁誉参半。《大公报》曾经刊载的文字，是当时的新闻，也是今天的历史，其内容之丰富、涉及之广泛，犹如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百科全书。研究和评说大公报，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和见识，难免贻笑大方。并无学术背景且才识浅薄如我者，何以贸然“闲话”大公报呢？说来有几分渊源。

先父张高峰，抗日战争中期加入大公报，作为一线记者，为之服务二十余年，经历了国家的抗战、内战，报纸的改组、转型，跨越了大公报从“新记”到“官媒”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他对大公报的情怀、讲述，以及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对这段经历的“反省、检讨”，我自幼耳熟能详，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包括我最终的职业选择。此其一。

其二，父亲在大公报最亲密的几位朋友，都是卓有成就的报人，又是我自幼就熟悉的长辈。他们当年在一起高谈阔论，我不时在侧恭听；他们晚年与父亲的通信，我几

乎都读过，并由我保存了下来。父亲去世后，我与其中几位父辈仍保持了各种联系，他们给我以许多关爱与教诲。从父辈那里，我也更多地了解了许多研究者不甚关注或者视野之外的大公报。

其三，从我来到这个世界，就在大公报的“圈子”里生活，直到它在大陆彻底关闭的前一年。确切地说，我出生时，“新记”天津大公报已经改组为半“官媒”性质的进步日报，正奉命筹划与上海大公报合并迁京出版；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则是在完全机关报性质的北京大公报“圈内”度过的。可以说，我对大公报的了解，有着专业研究者所没有的感性认知。

最后，我自己也做了二十余年新闻工作，并在这个岗位上退休，应该说，对报人的苦辣酸甜有着切身体验，也更能理解父辈的追求与艰辛。此外，由于职业关系，也为了更多地了解父辈，我曾大量查阅旧大公报，录得大批原始资料的同时，对它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和认识；又因为搜集、阅读有关大公报的资料和相关研究著述，从不同角度对比，感到无论学界或社会，对大公报仍有某些误解或误读，觉得自己也可以写一写我知道或我理解的大公报，做一点澄清。

基于上述缘由，才萌生了“闲话”的想法，陆续写来，历时数载，竟也可以汇集成册了，遂决心补充修订，整理付梓。

为什么名之曰“闲话”大公报呢？因为，它既不是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著作，也不是对大公报的系统评说，只是从个人理解和认知的角度，谈一点我对大公报的看法，讲一些我所了解的大公报人和事，关注一下研究者不曾特别留意的某些方面，充其量可作一家之言，为大公报研究抛一块引玉之砖。因此之故，它缺乏学术意义上的考证与研究，各章节之间也不一定具有逻辑关系或必然联系，但笔者将尽可能梳理清楚一些，让文字轻松一点，使“闲话”有些可读性。

需要说明并请读者理解的是：

第一，“闲话”相当部分引自《大公报》曾经公开发表的新闻报道，并做了必要的梳理与解读。这是因为，评价一张报纸，最重要和最有说服

力的论据，无疑应该是它公开见诸报端的文字（包括新闻与言论。以往研究和评价大公报，多以其言论为代表，做依据，固然有一定道理，但许多研究者却不甚关注远多于其言论，且为《大公报》这张新闻纸主体的消息和通讯，因而不免偏颇，至少是一种缺憾），那是历史记录，且有白纸黑字，无可掩饰，也极易辨析。“论从史出”，此之谓也。况且，直观历史原文，读者自有判别，无须论者多说什么。

第二，从“我知道或我理解”的前提出发，本书主要辨析的是新记大公报后期（1945—1949）以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大公报，亦即先父经历和讲述过的大公报，引用资料也多出自他及其关系亲密者，加之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亦非专业研究人员，因此难免囿于某种局限，发生畸轻畸重的现象。不过，由于“闲话”所说的人与事在大公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又多少弥补了上述缺陷。

“闲话”内容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一是关于大公报的历史演变，以及由此引出的大公报研究中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大公报”这块招牌存续已经超过百年，但在同一招牌下，不同年代的大公报却非一脉相承，其间几经变革，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此外，近年来有关大公报研究的文章很多，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常有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甚至以讹传讹的说法，本章对此提出了一些个人认识，并为后文厘清脉络。

二是关于大公报的政治立场或曰舆论导向，重点辨析指责大公报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一贯反动”的观点。用相关报道原文及当事者亲身经历，通过展示当年大公报记者笔下的国共两党形象，证明大公报站在民间立场，秉承“客观报道”理念，对两党都有正面宣传和负面批评，甚至对国民党“骂”得更多，对共产党“帮”得不少。至于大公报曾经有过的“反共”宣传，因为已有许多研究、评说，“闲话”点到为止，不赘述。

三是关于大公报的采编运作特色。大公报之所以在风云变幻的中国历史上成为一时的舆论重镇，是因为它有独特的采编运作方式，有一群自由、独立的职业报人，有他们自己的新闻理念。本章即以原始资料为例

证，以笔者所知为注解，做了相关介绍，兼及大公报人的职业精神与追求，以及对国民党钳制舆论的抗争。

四是转折时期《大公报》旧闻录。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年代，也是《大公报》作为当时的舆论重镇最具代表性的转折时期，本书对这一时期发生的、如今已被淡漠的几段历史，将当年《大公报》的相关报道做了梳理，用以解读大公报人的思想倾向、新闻理念，以便读者更直观地了解大公报。

五是关于天津《进步日报》与北京《大公报》。这两张报纸与新记《大公报》虽无传承却有关联，是先父告别新闻生涯的所在，也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圈子”，了解这两张报纸的来龙去脉，不仅有助于了解大公报从“新记”到“官媒”的改造过程，而且有助于理解最终“切断”新记大公报脉络的前因后果。

闲话并非正史，谬误在所难免。如果这本小册子能为对大公报感兴趣的读者所乐读，为研究大公报的学者提供一点可能有用的资料，我的付出便不是徒劳的。至于谬误，文责自负，更希望识者、方家批评指正。

新记大公报已经走进历史，但它留下的财富还在影响着后来者。

张 刃

2014 年秋·纽约

一、走入历史的新记大公报

——大公报研究中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

晚清以降，中国新闻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当之无愧。但对于《大公报》的评价，却曾有过极大的反差。

1949年以后的近四十年里，《大公报》被冠以“国民党政学系机关报”、“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一贯反动”的恶名，先是“清算”、改组，后经公私合营，最终成为一张官方的专业机关报。“文革”伊始，更遭封馆停刊，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大公报似乎“盖棺定论”了。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伴随着改革开放，才有人解放思想，开始为大公报辩诬、正名，始作俑者首推李纯青先生。他作为时任台盟中央负责人、新记大公报曾经的社评委员、沪馆副总编辑，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以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策反”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出任天津大公报改组后的进步日报副社长，于公于私都是一位评价大公报的知情人、权威者。李纯青先生的辩诬文章《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引起极大反响，具有“破冰”

意义和作用，此后，随着某些禁锢的被打破，和更多史料的披露，有关大公报的研究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深入，不仅有史料、有论文，更有专著，从还原历史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的确是一件好事。

但是，由于几十年负面评价的影响，一朝“正名”，不免矫枉过正。有关大公报历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众说纷纭，似是而非。特别是随着新记大公报渐行渐远，老大公报人凋零殆尽，现存史料又莫衷一是，对大公报的评价也出现了以讹传讹，甚至有所隐讳的现象，有从“一棍子打死”到“一味地赞誉”的倾向。（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有人说，“蒋介石从不看《中央日报》，也不看《新华日报》，但每日必读《大公报》。在他的办公室、公馆和餐厅里各放一份《大公报》，以备他随时翻阅。”这个说法曾经广为流传，但却从未见实证，倒是有许多佐证否定了其真实性。至少，为了知己知彼，蒋介石不可能“从不看《中央日报》，也不看《新华日报》”。显然，这是对大公报的溢美之词，却也有意无意地把大公报“推向”了蒋介石。）凡此种种，都无助于读者认识一个真实的大公报，也不能给予大公报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

这里愿就笔者所知，对若干有关大公报的话题提出一点看法，以为后文铺陈脉络，亦可视为这组“闲话”的引子或曰绪语。

大公报是“百年传承”吗？

说到大公报，学界总不忘提及，那是一张创刊于1902年，延续了漫长的一个多世纪，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报纸。

然而，这话错了，至少是不严谨的。

如果就“大公报”的报头而言，它确实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连招牌上那三个字都没有换。但如果讲大公报的办报宗旨、言论立场、报道倾向，乃至用人之道、经营管理，这些最应该属于传承的重要内容，那么，创刊

早期、鼎盛及转折时期和今天的大公报，除了同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弄清楚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要提出“传承”问题。

众所周知，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是分为几个不同阶段的。英敛之、王郅隆年代（1902—1925）为创始时期；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年代（1926—1949）为新记时期，其中，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到国共内战结束，更为大公报的鼎盛及转折时期；1949年迄今，大公报的变迁虽然十分曲折也比较复杂，但都是在新中国年代，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因此可以归一。

那么，人们现在讨论和研究的大公报是指哪个阶段的大公报呢？从绝大多数的相关论著看，都是指吴、胡、张时期的新记大公报——无论其言论、报道、经营、管理，包括常为论者提及、入选《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13位著名大公报人，除了英敛之，都属这个时期。而新记大公报只有不到23年的历史，在“大公报”这块招牌迄今113年的延续中只及五分之一，如此，怎能笼而统之地说什么“百年传承”呢？况且，更重要的是，它与此前、此后的大公报并没有前述各项实质上的传承关系。

先看“新记”之前的大公报。

1902年，《大公报》创刊时的重要历史背景，是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四年。其创办人英敛之，出身满族，祖上与清皇室曾有姻亲关系，他个人却又信奉天主教。作为一个思想、感情上新旧交织、中西合璧的知识分子，英敛之创办《大公报》的目的，是宣传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制，而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说，英敛之时代的大公报就开创了“敢言”传统的话，那就是反后（慈禧）拥帝（光绪），目的还是维护大清王朝。然而，历史的发展与英敛之的主观愿望相反，《大公报》创办9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帝制终结，中华民国成立。英敛之幻想破灭，心灰意冷，他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亦不能排除其“前朝孤臣孽子”的心理因素和思想倾向。延至1916年，英敛之卖出了他所持股票，大公报转手于王

郅隆。

王郅隆何许人？一个靠投机钻营、攀附于安福系的财阀。他收买大公报，目的是为安福系宣传、造势，并且有明显的亲日色彩。安福系是依附于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他们排斥异己，推行“武力统一”，并一度操控北京政府和国会。1920年直皖战争后，皖系首领段祺瑞下台，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下令解散安福系，通缉徐树铮等首要分子，王郅隆便名列其中。后由日本人保护逃亡并死在日本，王记大公报存续9年，为军阀割据、“亲善”日本鼓吹，是大公报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因此，也就被某些刻意强调大公报“百年传承”、“一贯敢言”的人有意无意地隐讳不提或一带而过了。但这是真实的历史，且有白纸黑字在，无可回避也不应该回避。如果讲“百年传承”，这段历史又该如何评价呢？

揭示英敛之、王郅隆年代大公报的背景，是为了说明，“新记”与他们除了买卖那块“招牌”，并没有传承意义上的关系。（如果说有，也就是新记大公报“三巨头”之一的胡政之，曾任王记大公报总编辑，历时三年，以失败去职。但这恐怕算不得“传承”。）而“新记”的命名，也正是为了有别于此前的英记、王记。

既然我们讨论、研究的大公报主要是它的新记时期，并且其办报宗旨、言论立场、报道倾向，乃至用人之道、经营管理都是独特的，不仅英记、王记没有，1949年以后也已不复存在，那么，有什么必要笼而统之地讲什么“百年传承”呢？不仅没有实质意义，而且可能混淆和误判历史。牵强附会讲“百年传承”，不是历史的、科学的研究态度。

此大公报非彼大公报

为了厘清“大公报”这块招牌的发展、演变脉络，也为了说明不同时期大公报的区别，还有必要再简单回顾一下新记大公报及其以后的历史。

大公报创刊于天津，新记公司接办也在天津，1936年设沪馆，出上海版，大公报第一次有了分馆。七七事变后，日寇先后占领平、津、沪，大公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毅然关闭了津馆、沪馆，又陆续设汉（口）馆、渝（重庆）馆、（香）港馆、桂（林）馆，八年抗战，颠沛流离，最后只剩了渝馆，其余各馆均毁于战火。抗战胜利后，大公报先后复建了沪馆、津馆和港馆，到1949年，以上海为中枢，设总管理处，沪、津、渝、港四馆并存，四版同出，是为新记大公报的最后格局，也是它的发展高峰并走向转折的时期。二十三年间，虽经流离分合、各自独立，但管理是统一的，宗旨是一致的，是“一家人”。

1949年以后，情况大变。除香港《大公报》外，先是天津《大公报》停刊，改组出版《进步日报》；继而上海大公报宣布“新生”，且对其他各馆失去“统管”职能；1952年，重庆《大公报》停刊，改组为《重庆日报》，与大公报彻底告别。1953年初，上海大公报又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为新的大公报，先在天津出版，1956年迁京，明确为中央财经系统的机关报，兼及国际政治、经济报道。此时的大公报与新记时期比较，除了一部分旧有人员，无论经济性质、办报宗旨、报道内容、言论立场，都已经没有任何关联。进入六十年代，王芸生虽在名义上仍为大公报社社长，却已不再过问编务。除少数编辑、管理人员外，抗战时期的旧大公报记者，绝大多数都以各种不同的原因调离或“清理”出去了。如此，还谈什么“传承”？

至于香港大公报，因为统战和宣传工作的需要，多少保持了一些“民间”色彩，也留用了一批旧大公报采编人员，但无论领导层面、办报宗旨，还是报道内容、管理体制，都与新记大公报截然不同了。况且，它与北京大公报也已经不是“一家人”，不仅没有隶属关系，而且由中共港澳工委直管。为了保持这块舆论阵地在香港的地位和影响，周恩来常常亲自过问香港大公报的工作，并一再提醒“不要在香港办学报！”负责港澳事务，与香港大公报直接联系的廖承志也提出，在香港办报纸，不要老摆一张“红面孔”、一副“极左”的架子。因此，香港大公报一度也曾“五颜

六色、五花八门”，刊出一些大陆媒体不可能报道的“打打杀杀、偷偷抢抢、非礼强暴、卿卿我我”，以适应香港读者的需要。（以上引述见有关人士回忆，恕不一一注明。）1966年“文革”初起，北京大公报被“新账老账一起算”，封馆停刊，寿终而未正寝，彻底结束了“大公报”这块招牌在大陆的六十四年历史。而香港大公报则迅速左转，俨然一面“红旗”，其影响和作用散见有关文章，即使非经历者亦可想而知。改革开放以后，香港大公报的发展、变化已非本文所及。总之，香港大公报与新记也没有“传承”意义上的关系。

如果一定要讲“关系”，只能说现在北京出版的《经济日报》创刊初期，与停刊多年的北京《大公报》还有些关联。“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一批报纸复刊。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1978年，原北京大公报一班人马奉命办起一张名曰《财贸战线》的报纸（这个报名还颇有些“革命”味道），1981年改为《中国财贸报》，1983年又改为《经济日报》。其最初班底的前北京大公报人中，有少数是新记末期加入大公报者。但仅凭这一点，很难说有与旧大公报有什么“传承”关系。

讲传承，都是从“好的”方面说，没有谁肯承认“坏的”传承。笔者曾与一位大公报前辈谈起这个问题，他说，当年把旧大公报骂得狗血淋头，说它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一贯反动”的时候，无论北京还是香港的大公报，都极力撇清与它的关系，“阶级阵线”划分得清清楚楚，那时，怎么没有人出来讲什么传承呢？如果说，那时“撇清”是出于某种需要或迫于无奈，那么，今天主动大讲“传承”，是否也是某种需要呢？特别是那个“小骂大帮忙”，也包括在这个“传承”里么？老先生这些话虽然不免尖刻，但这确实是个悖论，无法解释得通。

总之，以1949年为下限，新记大公报已经成为历史，后来的大公报，除了招牌，与之并无实质上的关联，更谈不上什么传承，不能笼而统之地混为一谈。

后文所说的大公报，凡没有特别限定的，都是指新记大公报。